

先秦



儒

家王权思想  
的历史演变

张亲霞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资助出版

# 先秦儒家王权思想的历史演变

张亲霞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绪 论

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主流的意识形态，君权是中国古代社会首要的支配权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学与君权互动关系的探讨，揭示儒学与君权结婚的历史渊源。

王权是古代社会最高的统治权。据学者考证甲骨文中的“王”字像刃部向下的斧钺形，斧钺既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是王权的象征，持有斧钺即拥有杀伐之权<sup>①</sup>。夏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也称“后”。商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也称“帝”。西周到春秋时期，国家的最高君主仍称王，又称“天子”、“天王”。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但当时除吴、越等周边诸侯称王外，中原诸侯仍然只是称君。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完全丧失，诸侯称王也称君。先秦时期，君，起初并不单指诸侯国君，《仪礼·丧服》云“君，谓有地者也”，天子、诸侯、大夫等凡有地者皆可称君。在西周权力等级体系中，周天子称王，诸侯称君。为了表述的方便，在本文中儒家的王权与儒家的君权的提法是一致的，都是指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

儒家的王权思想有其独特的含义，董仲舒对此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注解。董仲舒云：“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

---

<sup>①</sup> 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铉周遍；德不能匡铉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这里，董仲舒一方面突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儒家思想中王权与“德”密切结合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以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多方面，君权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处处都留有儒家文化的烙印。研究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儒家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分析儒家君权思想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学界的成果主要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比较零散的认识。如一些学者从君民关系的角度来评价儒家君权思想，认识到在儒家思想中只有真正的君权而没有民权，看到儒家虽然大讲重民、爱民，而其种种关于民的思想都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手段。如刘泽华先生就认为，儒家思想中民“并不是目的，一般地说，它只是一种手段，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是目的”<sup>①</sup>。又如一些学者谈到了对儒家君权思想实质的认识。俞荣根先生分析了儒家思想中君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儒家大一统君主主义同

---

<sup>①</sup>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一切君主主义理论一样，都通向人治主义，而不是法治主义，……儒家并没有找到克服君主滥用权力和由尊君而带来的权力腐败的正确途径，其大一统的君主主义与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之间，说到底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没有质的区别”<sup>①</sup>。以上这些问题涉及了儒家王权思想中君权和民权的关系、君权的实质等方面。学界的这些认识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儒家君权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学界对儒家王权思想缺乏整体研究，只是在研究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时涉及君权思想，对儒家君权思想的研究依附于其他问题的研究，缺乏独立的专门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界对儒家君权思想内容本身的研究很不够，但是对儒家君权思想实质是民主还是专制，儒家君权思想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讨论却相当热烈。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内含着专制主义的因素，儒学是君主专制制度之源。20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思考，儒家文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对象。当时一些革命者、思想家明确指出，孔子思想中有许多可为独夫民贼所利用的东西，实为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土壤<sup>②</sup>。“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直接把儒家思想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陈独秀针对三纲五常出于纬书，是由于宋儒的提倡，遂酿成君权万能之弊端，而原始儒家并非如此的说法，提出别尊卑、明贵

①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② 易白沙：《孔子评议》，《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02—15。

贱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也就是说孔教与帝制有直接的关系<sup>①</sup>。李大钊指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立说，故其说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sup>②</sup>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儒学包含有民主内容，或者儒学中蕴含着民主的种子。这种看法以新儒家早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贺麟、熊十力、牟宗三、张君勱、唐君毅等为典型代表。如贺麟就明确地说儒家传统本来就有民主精神，“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以及“民贵君轻”等就是儒家的民主思想<sup>③</sup>。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发表了《孔子再评价》一文，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历史上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康有为的孔子分开，认为从孔子本人的“礼”、“仁”来看，“孔子维护周礼，是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但他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要求保持、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又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仁学’思想在外在方面突出了原始氏族体制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而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孔子是“君主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sup>④</sup>。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中既有民主的一面，也含有专制的因素，所以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共生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相互对立

---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1916—11—01。

②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载《甲寅》日刊，1917—01—30。

③ 启良：《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7页。

④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6页。

的矛盾关系<sup>①</sup>。

另外，从儒家代表人物的君权思想研究看，学者对孔子、孟子、荀子等这些早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君权思想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以孔子思想研究为例。近代，伴随对中国君主专制之文化根源的追寻，作为君主专制之意识形态的儒学成为人们反思的一个重点。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人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易白沙、吴虞、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差不多都认为孔子的君权思想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之源，如易白沙就认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sup>②</sup>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评价孔子及其学说。如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提出，孔子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他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抗新兴封建势力，是保守派。孔子在哲学上要保持已经动摇了的上帝的的神权，和他在政治上力图维持已经崩坏了的奴隶制（周礼）王权立场是一致的”<sup>③</sup>。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学界对孔子王权思想的评价则比较客观，如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主尊君，但不主独裁”<sup>④</sup>，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是王权主义者，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

---

① 王一农：《先秦儒家精神与中国社会政治之关系》，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② 易白沙：《孔子评议》，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6号，1916—02—15。

③ 转引自宋仲福等：《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1991年出版，第297页。

④ 张岱年：《孔子哲学解析》，载《中国哲学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张下级统治者服从上级统治者，各级统治者服从周王，权力集中于上，但是他的集权思想只是利用封建领主总头目周天子的政治躯壳，而注进了春秋后期集权精神的新血液。”从儒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之源角度出发，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主张君主专制的。这种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浪潮是伴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发生和进行的，因而具有很强的为现实革命服务的功利性，因此在对问题的看法上就难免失之客观。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儒家王权思想的评价口气上有所缓和。张岱年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中指出，孔子“尊君而不主独裁”<sup>①</sup>，并加以详细论证。而有的学者只是指出“孔子是把师权与君权分开来的第一人”<sup>②</sup>，有的学者认为“孔子主张王权，开中央集权制之先河”<sup>③</sup>。但是并未见详细论述。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孔子王权思想中的民主、人道主义的一面。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儒家王权思想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但是人们对儒家的王权思想，儒家代表人物的王权思想究竟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

对同一个思想家的认识由于人们的出发点不同差异性也很大。这方面学术界对孟子君权思想的评价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对孟子君权思想的评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1. 积极性的评价。有人认为孟子民贵君轻的王权思想，

---

① 庞朴、马勇、刘貽群编：《先秦儒家研究》2003年版，第495—496页。

② 杨玉清：《儒家的政治哲学》，《孔子研究论文集》，中华孔子研究所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③ 夏子贤：《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研究论文集》，中华孔子研究所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奴隶制束缚下的生产力的历史要求……是对殷周奴隶社会长期形成的君权神授思想的公然反叛，它打击了国君的绝对权威，强调了人民的重要，在君权至上的时代里，这是具有启蒙意义的革新思想”<sup>①</sup>。还有人认为“像（孟子）这样富于人民性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是不多见的，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sup>②</sup>。甚至有的研究者指出：孟子有“朴素的民权观”，其中已经蕴含了近现代民主的原初观念形态。“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具进步性的永恒的思想主题，它是以人民为国家政治本体的一种思想体系”<sup>③</sup>。

2. 消极性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孟子向统治者提出民贵君轻等等表面似乎很进步的主张，其实只是拿被统治者的力量和声势去吓唬统治者，迫使统治者向被统治者让步，以接受他的恢复井田、正经界的主张，把奴隶社会紧张的阶级对立关系维持在比较缓和的基础上”<sup>④</sup>。有的学者认为“孟子的限制君权尊重民意的主张，都是对我国上古的原始遗存的继承，属于前文明时代的传统”<sup>⑤</sup>，因此认为不能把孟子的王权思想提得过高。

3. 折衷主义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历来评价孟子‘民

---

① 乔长路：《关于孟子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② 梁启雄：《孟子思想述评与探源》，载《新建设》1961年第8期。

③ 王引淑：《略论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④ 彭引维：《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阶级地位及孟子的政治思想》，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

⑤ 罗祖基：《孟子民贵君轻说评析》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贵’思想的人，多半倾向夸大其‘民主’的一面，很少考虑它的折衷主义的一面”，认为孟子“在争取调整君臣关系的同时，附带吹嘘一下改善君民关系的必要性，折衷主义地提出‘民贵’、‘君轻’的口号，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挡箭牌”<sup>①</sup>。当然除了上述的有关认识之外，有的学者也能够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孟子的君权思想，如有的研究者就提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有民权论的成分，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政治主体是君主。

先秦儒家君权思想是发展变化的。孔、孟、荀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从以上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无论是从儒家君权思想的整体还是从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研究，都显示出对先秦儒家君权观内容到底是什么缺乏明晰的认识，更谈不上对儒家君权思想演变过程，以及对演变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君权思想与君权现实，与整个社会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

## 二

先秦儒家王权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观念的基础，奠定了儒家王权思想的基本精神，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有在对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知道儒家君权思想的实质是什么，也才能真正搞清楚先秦儒家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之间究竟是否有渊源关系。研究先秦儒家君权思想，对儒家君权思想从源头上加以梳理，可以弥补学界儒家君权思想内容研究方面的缺憾。

---

<sup>①</sup> 刘毓璜：《孟子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11期。

先秦儒家的君权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儒家的君权思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代表人物那里是不同的，孔、孟、荀的君权思想就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孟子和孔、荀之间的差异更大。结合具体的社会发展了解先秦儒家君权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会发现先秦儒家思想虽然有共同点，但是也有差异。过去，我们经常忽略这种差异性，学界对儒家君权思想的实质、儒家君权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之关系等问题的争论焦点即在于此。因此研究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对我们认识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实质，对于认识儒家君权思想和君主专制的关系等有重要意义。

研究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君权思想始终是围绕着寻找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个轴线演变的。孔子以“礼”为核心，主张君臣的权力应该以礼为界限。和孔子所认识的君不君、臣不臣是社会的失序不同，孟子认为君臣无常位是正常的，君主只有爱民、保民才能赢得民的归顺，才能使君权稳固和扩大，社会才能真正稳定。荀子的时代为了建立适合统一中央集权政治的新秩序，他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采来加强君权。从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寻中，随着周礼的解体和官僚政治的形成、稳定，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起初过于理想化，不适合现实君权发展的需要而为诸侯国君所冷落到逐步适合君权统治，并最终在汉代成为君主统治天下的工具的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儒家君权思想与现实的君主统治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儒学与现实君主统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才能客观地认识、评价儒家的王权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加深我们对先秦儒

学以及先秦时期社会的认识。

### 三

儒家君权思想是随着中国古代宗法贵族政治的解体和官僚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巩固而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西周时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形成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权力等级金字塔。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权力体系也逐渐崩溃。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王权衰微，社会权力出现了下移的趋势。周、郑交质，祝聃射肩，齐楚窥鼎等一系列事件，明显地反映出周天子的权威下降，诸侯方伯之势日盛的局面。到了春秋中、后期鲁国“三分”、“四分”公室，三家分晋，陪臣执国命，政在私门，权力进一步下移。伴随着原有的权力体系的解体，新的以政治、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开始萌芽发育。齐国管仲、郑国子产等先后在本国进行了加强诸侯国君权力基础的改革，晋、郑等国也先后颁布了成文法。旧的权力体系解体而新的权力结构处于组合时期，权力体系的变更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什么样的君权才能使社会稳定，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儒家君权思想就是在对重建社会秩序的思考中树立起来的。

儒学宗师孔子生于周礼文化传统深厚的鲁国，鲁国的礼乐文化是孔子王权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孔子君权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在君权衰落的时代，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来恢复周天子及诸侯国君的权威，从而实现他所说的有道之世的政治理想。周礼通过把君王的行为纳入

礼的秩序、规范之中，一方面显示君王的尊严和权威，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礼的规范限制君王，使君王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孔子认为“复礼”的关键是加强君主的道德修养，强调君王要为政以德，只要君主能够具有以“仁”为核心内容的各种道德，就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在现实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认为“复礼”的途径首先是“正名”，名正了，君王的权威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孔子所生活的年代，由于井田制的衰落、私有制的兴起，周天子通过分封制建立的早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以血缘关系为主建立起来的贵族政体处于风雨飘摇中。孔子君权思想整体来说是复古的。但是他的王权思想继承了周代王权思想中人道的一面，并进一步强化，从这一方面说孔子的君权思想奠定了儒家王权思想的基本格调。孔子的王权思想在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战乱时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现实中，孔子在各国处处碰壁。对此司马迁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礼为核心的权力体系是建立在宗法世袭制、分封制的基础上，而孔子的时代，旧的宗法世袭制、分封制都在发生着变化。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看，新出现的官僚制则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孔子在形式上以礼为王权思想的核心明显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孔子思想本身包含着求道与入仕的两面性，孔子弟子们的兴趣与志向又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孔子身后儒学的主要传播地魏国与儒学的原生地鲁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孔子死后，其弟子的君权思想产生了分化。孔子弟子中的一些人在思想上信仰、传播其师的道德君权思想，另一些人则在实践中使儒家的君权思想发生了变异。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等人在实践中寻求维护君权的方法，李悝、吴起等法家的先驱都与子夏的“西河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子夏的“西河学派”使儒家的君权思想在与君主需要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变异，法家的君权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与子夏的“西河学派”不同，子思学派把孔子君权思想中对道德权威的论述发扬光大。子思一派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德”为核心的君主权威系统。把“德”与君主的权位紧密相连，并且认为“德”是形成君主权威的必要前提，所以君主应该“反求诸己”，来培养自身的品德，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不仅如此，君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也要以“德”行事，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使万民归附。子思一派把三代以至孔子以来的德化君权的思想强化、系统化了。子思一派还通过把君主之德与天道、与圣的结合使君权更加神圣，也更加能够符合天理人情。子思一派的君权思想是儒家君权思想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子思一派对君主道德权威的系统化、圣化为汉代儒家君权思想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埋下了伏笔。

战国时期随着早期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国家形态的解体，以地域、政治关系为主的新的国家形态粗具模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也逐步形成。经过各国的相继变法到战国中期几个主要的诸侯国家中诸侯国君的权力基本上得到了稳定。孟子生活的年代，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与孔子不同，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的礼制秩序是不能够被破坏的，而孟子则认为如果君主暴虐于民，君主将臣下视为草芥，则民可诛伐暴君，贵戚之卿可以取代君主自立。孟子

民可废君、臣可代君的君权思想与战国时期官僚政治的用人制度下血缘关系松弛，有才能的人得到社会的重视，士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从当时中集权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孟子的君权思想是不利于君主集权，也不合乎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想方设法加强君主统治的现实需要。稍早于他的墨子主张通过建立金字塔式层级官僚机构来加强中央集权，与孟子同时代的法家也主张加强君权，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是牺牲道德的方式来加强君权，和他们相比较孟子的君权思想虽然更切近民主化、人民化，但是不适合现实中君主的要求，所以难免有迂阔之嫌。但是孟子的君权思想继承了前期儒家君权思想中的王道并把它发扬光大。孟子的君权思想强调民本，强调仁政，把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相对立，主张实行王道政治，这些是孔子君权思想中人道主义成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孟子的君权思想从根本上说属于儒家，但却是先秦儒家君权思想中的重大突破。孟子和孔、荀强调君主集权下的礼治等级思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战国时期儒家的君主道德权威思想陷入了困境之中。儒者奉行君主道德权威思想在现实中出现了像屈原那样的悲剧。君主对用仁义为统一天下的手段很是冷落，深层上看儒家道德权威的困境在于儒家君权思想和君主迫切需要加强君权现实的背道而驰。

战国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明朗化，分裂割据局面趋于结束，天下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加强君主的权力？怎样才能实现天下的统一？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礼治思想，提出了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君权思想。荀子认为君王享有最高立法权，是“礼”“法”之源。君王是“国之隆者”。君主以礼为主，“礼”和

“法”并用作为加强权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荀子认为，君主只有礼法兼采、王霸并用君权才能得到巩固。在荀子的观念中，“礼”、“法”源于君王，君王又是“隆礼重法”的主体，同时“礼”、“法”又是加强君权的手段，所以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以行王道，来约束君王，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荀子君权思想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成为儒家君权思想在汉代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逻辑契机。荀子的君权思想和韩非子的君权思想在强调君主集权方面有相同之处。但是荀子的君权思想强调君主因道德感召力产生的权威作用，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王道思想，因而在君王权力的行使手段上和法家有质的区别。与他之前的儒者不同，荀子的君权思想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既兼有传统儒家君权思想的道德理想性，同时也有一定的现实性。

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是从孔子以礼为核心，君君臣臣之秩序不可变更开端，经过了子思一派把儒家君主道德权威加以系统化和神圣化，子夏的西河学派把儒家君权思想进一步和现实君主统治的需要相结合，并且在结合中使儒家的君权思想发生了变异。儒家君权思想发展到孟子突破了孔子周礼制约下的君权的等级性以及权力的不可僭越性，认为君臣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秩序，君主如果能够实行仁政，能够保民、养民，那么君主就能赢得万民的归附，君权就有保障；如果君主不能保民、养民，而且君主视臣如草芥，那么民就可诛伐暴君，贵戚之臣就可取君位而代之。孟子的君权思想是儒家君权思想的重大突破，但是面对现实却处处碰壁。儒家的君主道德权威在战国君主加强君权的时代必然陷入困境之中。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提出了加强君权的一些适合社会发展的具体

措施，荀子把儒家的君权思想在战国末期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先秦儒家从孔子以礼为核心来建构君权秩序，中间经过孟子君臣秩序的可变更，到了荀子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企图用礼法来加强尊卑贵贱的权力秩序，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发展过程。先秦儒学集大成者荀子的君权思想是对儒学宗师孔子君权思想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先秦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是围绕着社会秩序的建构，围绕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条主线进行的。孔子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企图通过权力结构的重建，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孟子则是通过民可废君，臣可代君的君权的可变动性来寻求能够使天下“定于一”的理想君主。孟子认为只要能够实行仁政，能够保民、养民的君主也就能够使天下稳定，使民安居乐业。荀子主张君主利用礼、法的手段来加强君主统治下的权力秩序，加强整个社会秩序。

儒家君权思想的演变是在先秦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进行的。春秋到战国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旧的权力秩序在逐步崩溃，新的权力秩序在逐步地建立。这一时期，西周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权力秩序在逐步地瓦解，新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权力体系在逐步地形成。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基础，人与人之间有限的交往，是宗法血缘关系存在的土壤。由于宗法血缘关系在社会转型中的延续，春秋到战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宗法分封制下的权力结构的某些内容和形式在新的权力体系中被保留下来了。正是由于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这个特点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儒家君权思想中注重伦理道德在权力中的作用，注重君主的道德权